

主编 许志功 丁士峰

政治理论 学习指南

ZHENGZHI
LILUN
XUEXI
ZHINAN

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沿理论研究



国防大学出版社

政治理论学习指南

——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沿理论研究

主编 许志功 丁士峰
副主编 肖冬松 朱康有

国防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政治理论学习指南/许志功，丁士峰主编. —北京：
国防大学出版社，2002. 9
ISBN7-5626-1213-7

I . 政… II . ①许… ②丁… III . 政治理论—高等学校—教学参考资料
IV . 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9214 号

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区红山口甲 3 号)

邮编：100091 电话：(010) 66769235

北京国防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 960 毫米 1/16 印张：23.25

字数：302 千字 印数：3000 册

定价：4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代序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 50 年的回顾	黄楠森 (1)
一、世纪之交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综述	(14)
(一) “九五”期间哲学研究的主要成果与 特点	(14)
(二)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曲折发展及 教训反思	(17)
(三) 新世纪面对全球化，我国马克思主义 哲学需要解决的新课题	(19)
(四) 当代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考	(22)
(五) 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概况	(24)
(六) 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概况	(29)
二、哲学学研究	(36)
(一) 哲学的本质	(36)
(二) 哲学的对象和功能	(40)
(三) 哲学的基本问题	(44)
(四) 哲学认识方法论	(46)
(五) 哲学的发展趋势及未来走向	(49)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总体性研究	(55)
(一) 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阶段的划分	(55)
(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总体发展的状况分析	(57)

(三)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未来发展	(60)
四、实践观研究	(67)
(一) 对实践观若干具体内容的探讨	(67)
(二) 实践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 和作用	(72)
(三) 实践观的丰富和发展	(77)
五、价值问题研究	(85)
(一) 价值问题的研究对象	(85)
(二) 价值问题的界定	(86)
(三) 价值本质的讨论	(88)
(四) 价值论的理论体系	(90)
(五) 价值研究的方法论	(91)
(六) 关于价值评价	(92)
(七) 道德价值研究	(93)
(八) 价值冲突研究	(93)
(九) 价值多元性与一元性的关系	(95)
(十) 价值论的发展趋势	(96)
六、真理观研究	(99)
(一) 真理内涵的争论	(99)
(二) 真理形态的争论	(100)
(三) 感性的或经验的正确认识是否为真理 的争论	(101)
(四) 客观真理与有无主观真理的争论	(103)
(五) 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争论	(105)
(六) 真理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动力问题	(106)
(七) 关于检验真理标准的争论	(107)
(八) 真理和价值的关系	(109)

七、主体及主体性研究	(113)
(一) 主体及主体性的本质规定	(113)
(二) 主体及主体性与认识论、历史观、 价值观	(119)
(三) 主体及主体性与当代社会发展	(123)
(四) 主体及主体性研究的发展方向	(126)
八、人学问题研究	(131)
(一) 人学内涵的讨论	(131)
(二) 人学与哲学的关系	(134)
(三) 人学的研究对象	(136)
(四) 人学研究的视角和方法	(139)
(五) 建构人学理论的思路	(140)
(六) 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研究	(142)
(七) 人类中心主义论探讨	(144)
(八) 社会现代化和人的发展	(145)
(九) 全球化与人权的关系	(146)
(十) 人学与人文主义、科学主义	(148)
九、历史决定论与选择论研究	(151)
(一) 历史决定论和选择论的含义	(151)
(二) 历史决定论和主体选择论的关系	(157)
(三) 历史规律可否被创造或消灭的争论	(160)
十、科技进步与当代中国实践研究	(165)
(一) 当代西方学者对科学与实在关系的 争论	(165)
(二) 技术及社会功能	(168)
(三) 科学和技术的关系	(171)
(四) 科技进步和社会、人的发展	(172)

(五) 科技进步与当代中国实践	(175)
十一、经济全球化与哲学发展研究	(181)
(一) 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源头	(181)
(二) 经济全球化和全球化本质的界定	(183)
(三) 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185)
(四)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哲学发展趋势	(191)
十二、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研究	(198)
(一) 市场经济对道德观念的影响	(199)
(二) 当前道德问题的实质	(201)
(三) 道德问题的成因分析	(203)
(四) 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道德建设的内容	(205)
(五) 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要把握和处理 好的几个问题	(207)
(六) 道德建设的有效途径	(208)
十三、军事哲学研究	(214)
(一) 军事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能否存在	(215)
(二) 军事哲学的研究对象问题	(216)
(三) 军事哲学的理论体系问题	(219)
(四) 军事哲学的主要功能问题	(220)
(五) 如何从当代军事实践出发，深化军事 哲学研究	(226)
十四、领导哲学研究	(229)
(一) 领导哲学的学科地位和研究对象	(229)
(二) 领导哲学的理论体系	(230)
(三) 关于领导主体	(232)
(四) 关于领导本质	(235)
(五) 关于领导辩证法	(239)

(六) 关于领导要素论	(243)
(七) 领导哲学的发展方向	(245)
十五、文化哲学研究.....	(248)
(一) 文化哲学的研究对象	(248)
(二) 关于文化的定义	(249)
(三) 关于文化的分类	(251)
(四) 文化哲学的发展历史	(252)
(五) 人类精神的演进与走向	(254)
(六) 哲学理性精神的重建	(255)
(七) 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	(257)
(八) 文化哲学的理论体系	(259)
(九) 传统文化的价值及其对现代化的作用	(260)
十六、经济哲学研究.....	(263)
(一) 现代经济哲学兴起的学术背景	(263)
(二) 经济哲学的学科定位	(266)
(三) 经济伦理研究	(269)
(四) 经济哲学深入发展研究	(271)
附录一 要读出邓小平理论的厚重感来.....	(275)
附录二 形成·内涵·地位	
——对江泽民“七一”重要讲话的哲学思考	(286)
附录三 关于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几个问题.....	(302)
附录四 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兼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哲学思想	(319)
附录五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新探索.....	(340)
后 记.....	(362)

代 序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 中国 50 年的回顾

黄 楠 森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 50 年，是凯歌前进的 50 年，也是经历了多种失误，受到多种挑战的 5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走过的道路是很不寻常很不平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走过的道路也是很不寻常很不平坦的。我作为一个专业的哲学工作者亲身经历了这段历史，根据个人经历回顾一下这段历史，总结一下其中的经验教训，对于进一步搞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工作也许有些裨益。

马克思主义哲学 50 年的历史，同中华人民共和国 50 年的历史一样，可以分为三个大的阶段：1949～1966 年、1966～1976 年和 1976～1999 年。下面我们就来评述一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三个阶段的历史。

（一）第一阶段

1949～1966 年是我国恢复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传播和发展的时期，它根本改变了中国哲学的面貌，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也有不少的失误。这段历史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思考：

- (1) 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地位的改变。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开始在中国传播的，其理论形态最初是唯物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到30年代初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但它最初只是在革命知识分子中流传，后来在解放区可以公开传播，在国民党区则被打入地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都会受到镇压。全国的解放立刻改变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地位，从革命人民的哲学上升为国家指导哲学思想。它不仅在各大学成为最热门的学科之一，而且得到全社会的推崇。加之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出版和党中央、毛泽东本人的提倡，几度出现全国学哲学用哲学的高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崇高地位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这种地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研究和发展是极为有利的，而且确实也得到了大规模普遍性的传播，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在下面将具体讨论，但也产生了一定的弊端，即强调它的意识形态性而忽视它的科学性，强调它的权威性而忽视它的学术性，加上教条主义和个人迷信作祟，它的科学的研究和学科建设被大大地削弱了。这种情况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崇高地位带有一定程度的虚假性，有一些人对它的推崇多少带有赶热潮的成分，并非真正服膺于它的科学性。这就埋伏下改革开放以后有些人从“马克思主义者”变成马克思主义反对者的原因。

有一种看法不是实事求是的，这种看法认为有些具有自己哲学体系的老哲学家解放后放弃自己的体系而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完全是违心的，完全是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政治形势的变化对老哲学家的哲学思想的转变诚然是一个原因，但也只是一个契机，它推动他们考虑和重新评价自己的哲学思想，而是否要改变自己的哲学思想，从根本上说还是由他们自己选择的。不愿改变自己哲学立场的大有人在，而我所了解的几位师长，他们哲学立场的改变确实由于他们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他们原有的哲学是非科学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性是无可怀疑的，它是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反映，又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指导思想，因此，在革命胜利之后它成为国家指导哲学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它也具有科

学性，在这一点上与其他科学并无二致，而且正因为它是科学的，所以它能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性和科学性是不可分的，只看见或只强调一方面都是片面的、错误的。

(2)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流派，以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与科学性从众多流派中脱颖而出。按其性质，它当然易为人们所理解，不像其他现代西方哲学那样晦涩难懂，但它毕竟不同于一般自然科学，有一个如何适应中国具体条件的问题，这就是它的中国化和发展，即采取中国人民熟悉的形式来表现自己，并增加一些适应中国条件的新因素。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也是它中国化和发展的过程。前面提到的毛泽东的“三论”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发展的典范。《实践论》和《矛盾论》本是 30 年代毛泽东系统讲解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的讲课提纲中的两篇，新中国成立后加以修改补充重新发表，它们的理论来源是马列著作和苏联哲学教科书，但在内容和表述方式上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并在许多点上丰富了辩证唯物主义，这两篇文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科建设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不是为学科建设而作，而是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的运用，但它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论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也具有学科建设的意义。这三篇文章对于中国专业哲学家建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决不能低估中国专业哲学家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发展所起的作用。解放初期苏联专家在中国讲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翻译过来的苏联新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采用的都是斯大林在《联共党史》第 4 章第 2 节中所建构的体系，但中国哲学家还来不及采用这个体系来编写自己的教科书，斯大林就去世了。中国哲学家在 50 年代初可能按这个体系讲过课，但不久就采用了苏联 30 年代初的体系，我个人在 1957 年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采用的就是苏联 30 年代初的体系。50 年代末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 6 校各自编写的

哲学教科书和 60 年代艾思奇主编的哲学教科书均以苏联 30 年代初的体系作为大的理论框架，吸收了中国哲学史中的一些思想，特别是毛泽东的理论贡献。这个理论形态当然还是属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类型，但它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对旧体系有所突破，有所发展，与旧体系有明显的区别，其中包括了中国哲学家的辛勤劳动和创造性贡献。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采用的体系是斯大林的体系，这是与事实不符的。

但是，应该指出，从学科建设来讲，中国哲学家未能真正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这门学科的性质出发来科学地建构它的体系，而主要是从已有体系，特别是苏联 30 年代初的体系出发作些调整，也就是说，未能摆脱教条主义的影响，因而未能制订出与 20 世纪科学水平相适应的崭新的哲学体系。

(3) 关于若干哲学问题的讨论。从 50 年代到 60 年代有过五次哲学问题的规模较大的公开讨论或批判，给人印象至为深刻（与哲学无关的未计人）。这些讨论或批判就是：实用主义批判、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或“抽象继承法”批判、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性质问题讨论、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讨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问题讨论。这五次批判或讨论的经验教训很值得总结。对实用主义自始至终是批判，关于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性质自始至终是讨论（虽然有时争论很激烈），其他三次都是以讨论始，以批判终，但对“抽象继承法”的批判没有上纲为政治问题。对这几次讨论或批判，我有三点想法：

第一，当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还没有转变成为批判的时候，大家的思想都比较活跃，不同的观点互相比较，互相辩论，每次讨论均使大家认识有所深入，分歧逐渐消解，确实收到真理愈辩愈明之效。例如关于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性质问题，经过不同意见的交锋，大多数人都认为其中尽管包含阶级利益的对立，矛盾的性质还是可以转变的。又如关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关系，经过讨论，大多数人认为二者的关系是复杂的，不能把它简单化为绝

对的对立。其他问题，莫不如此。

第二，当自由的讨论转变成为批判的时候，真正的讨论就没有了，剩下的只是没有答辩的讨伐。从广义讲，批判就是分析、反对、反驳，讨论实际上就是互相批判。但那时所说的批判是在一定的指示下或授意下对某一个人或某一观点群起而攻之，批判者的批判不完全出自本意，被批判者毫无辩解的权利。通过批判，不但不能说服被批判者，也弄不清真正的是非曲直，因为结论是已经定下了的，批判不过是找理由来证明其“错误”而已。由于被批判者往往是正确的，或至少有正确之处，而批判是要证明其完全错误，于是批判者只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片面夸大，或者索性歪曲被批判者的原意，甚至虚构某种观点以便加以批判。例如对于“抽象继承法”我当时也批判了，但我就始终想不通，对于古代的观点或理论（百分之百正确的除外）不加以区分和分析（即所谓“抽象”），怎么可能继承呢？又如实用主义是唯心主义哲学流派，其基本观点是应该批判的，但不能说实用主义理论句句是谬误，不能句句都要批判。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本来说得不错，但那时也要批判。这种批判就没有什么是非可言了。当然，这决不是说，对错误的观点或理论根本不能批判，该批判的还是应该批判，但批判必须是摆事实讲道理，有分析的，实事求是的。

第三，学术或理论问题是是非问题，不是政治问题，随便给学术或理论问题下政治反动的结论，即所谓“政治上纲”，学术研究就终止了。学术，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问题，同政治当然是无法截然分开的，但也并不是绝对分不开。只要是学术或理论问题，总可以讨论其是非，一般情况下都没有必要追究其政治意义，一旦同政治挂钩，学术讨论就终止了。例如“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的讨论最初是一个对对立统一规律的理解问题，即学术问题，在讨论中人们对矛盾规律的对立与统一两个方面及其相互关系都有了进一步深入的理解，但后来主张合二而一的观点被上纲为主张阶级调和论的修正主义，学术讨论也就中断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中国成立前主要处于传播、通俗化的阶段，真正把它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是建国以后的事。在研究过程中，人们会有种种意见分歧，甚至出现一些偏差，都是正常的，难以避免的，只要能及时加以克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不会受到太大的阻碍。不幸的是一些偏差不但未能克服，而且进一步发展，直至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变成为它的反面，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事。下面就来讨论这个问题。

除这些比较活跃热闹的活动而外，在一些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还进行过一些安静的搜集资料、翻译、诠释和研究的工作，没有这些静悄悄的扎实的工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科建设和进一步发展也是难以实现的。同时，其他哲学领域，如中外哲学史、逻辑学、美学、伦理学、科技哲学等哲学学科虽然比较专门，研究者比较少，但它们离现实生活远一点，受干扰也少一点，加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都取得了较大进展，比解放前面貌大为改观。

（二）第二阶段

1966～1976年是全国经济、政治、文化陷入极度混乱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旗帜表面上举得很高，实际上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的时期，在此期间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但没有发展，而是备受曲解和践踏。上面谈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大障碍，一是单方面的全盘否定的“批判”，一是把学术问题上纲为政治问题，“文化大革命”把二者都发挥到极致，在此情况下当然就没有任何学术讨论与研究可言了。1970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我被分配从事教学工作，学校又开始有些学术内容的教学活动。特别是1972年周总理指示恢复系统教学以后，北大哲学系组织部分教师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和编写工作，虽然后来周总理的指示被诬蔑为“右倾回潮”，这个工作仍然继续下去了。应该承认，这是一种基础学科建设工作，是很有学术价值的，我估计全国各地像这种静悄悄的集体的或个人的学术研究一直没有中断过，即使在

“文化大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以全国之大，总还有“文化大革命”的锋芒达不到的地方，总还有人从事认真的学术工作。当然，这种成果在当时是发表不出来的，甚至不敢公开出来，能够发表的只有宣传“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论著，只有批判他人或自我批判的论著。我曾经参加过一项批判工作，即批判《论语》，它是当时政治运动“批儒评法”中的一项任务，其指导思想是《论语》句句是谬误，句句都要批，都要上纲。像“学而时习之”也要批，也要上纲。其成果叫做《〈论语〉批注》，由于上纲没有上到点子上，未能公开发表，改由内部发行。我个人一直为此事感到内疚，但它颇具典型意义。物极必反，改革开放终于带来了中国学术的春天。

（三）第三阶段

1976 年～1999 年是结束“文化大革命”并开始改革开放、重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期，也是正本清源、在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指导下恢复和发展正常的学术研究的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当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20 多年来，特别是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实践标准讨论启动的“双百方针”得以认真贯彻，学术研究与讨论显示出勃勃生机，对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一个接着一个进行。与之相适应，全国各省市的理论刊物大量涌现，犹如雨后春笋。公开发表的学术论著数量之多、研讨之细致深入、创意之新颖，不但解放前无法与之相比，新中国成立后头 30 年也难望其项背。就哲学讲，各门哲学学科都出现繁荣景象，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是各门哲学学科中讨论和研究最热的学科。我认为规模较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讨论有以下几次：

（1）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个问题首先是作为政治问题提出来的，但这次讨论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四人帮”被推翻后百废待兴，但旧的思想路线（“两个凡是”是它的具体表现）严重地阻碍着“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的解决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开展，真理的实践标准的讨论应运而生，它恢复了马克思主义思想

路线，成为改革开放的先导。在政治目标实现以后，哲学界又深入研讨了实践标准理论本身的问题，发表了不少不同意见。如果说，在实践是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上绝大多数学者的意见是一致的，那么，在如何用实践来检验的问题上，分歧就很多了。对其中若干问题，学者们至今仍有意见分歧。

(2) 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人道主义是西方近现代思想史中的重要思潮，在马克思主义萌芽、形成和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这使它成为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共同关注的理论焦点。但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前，人道主义被全盘否定，在改革开放之后它被提出来重新评价是很自然的。经过讨论，全盘否定人道主义的观点被否定了，但在如何评价上发生了分歧，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人道主义，即现代的科学的人道主义；另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包括作为伦理原则的人道主义，即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却否定了作为历史观的人道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历史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异化的扬弃的历史），因为这种人道主义是唯心史观。我认为把历史上的人道主义区分为伦理原则和历史观两个方面是人道主义史上的一次理论突破，是这次讨论的一个重要成果。

(3) 关于主体性和主体性原则的讨论。人的活动的主体性和主体性原则的讨论是从人道主义的讨论中引发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从未否认过人是主体、人有主体性，但我国过去曾经有过把主体性或主观性等同于主观主义的偏向，因而忽视了对人作为活动主体及其主体性的研究，这次讨论无疑是很有理论意义的，对于改革开放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争论发生在如何评价主体性原则，是否应该用主体性原则来改造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它成为主体性哲学。对这个问题至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4) 关于价值论问题的讨论。这个问题又是由主体性问题引发的。因为主体性中必然包含价值性。马克思主义从来也不否定价值，但把西方价值论完全看做唯心主义加以否定，从而忽视了价值论的研究。价值论问题的提出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开辟了新领域，弥

补了学科建设的空缺，特别是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追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5) 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这是一次规模宏大、内容复杂、涉及面甚广的讨论，许多讨论聚焦在实践唯物主义上面。首先是对实践唯物主义理解上的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它就是实践的唯物史观，另一种观点认为它是以实践作为研究对象的唯物主义，并认为哲学的对象就是实践，第三种观点认为它就是实践本体论或实践一元论。其次是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上述第一种观点认为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即历史唯物主义，第二、三种观点主张以它来取代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实践唯物主义，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它不是马克思的哲学，而是恩格斯、列宁和苏联哲学家的哲学。已经出版了好几本以“实践唯物主义”命名的专著，讨论将长期进行下去。

(6)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讨论。许多讨论都指向一个根本问题：究竟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什么？这就涉及一系列问题：它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它在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处于什么地位？它与其他哲学的区别与联系怎样？它有什么原理原则？它的组成部分有哪些？它的思想体系怎样？它的功能是什么？……这个问题还涉及究竟哲学是什么？它是不是一个知识部门？如果是，它的对象是什么？它与其他知识部门的关系怎样？……关于这些问题，观点十分分歧，短时间内难以达到一致。但显然可见，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了，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面貌都将大为改观。

(7) 关于部门哲学的研究。部门哲学最早常称应用哲学，指把一般哲学原理应用于某一部门而形成的哲学体系，如自然哲学、社会哲学、历史哲学、精神哲学、科技哲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法哲学、文化哲学、教育哲学、艺术哲学、道德哲学、管理哲学、领导哲学、认识哲学、宗教哲学等等。由于应用哲学又可以理解为以哲学的应用作为研究对象的单门学科，上述哲学群还是称为部门哲学好。这是一项庞大的研究任务，从事这种研究的是一支庞大的队